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

一救济学生生活、组织回国运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一

王雪萍

序言

战后的日本，在 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占领下，经济、社会持续混乱。在此情况下留日学生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日本各地相继组织了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留日学生¹团体。这些留日学生团体，最初是由大陆和台湾学生分别成立的，并各自壮大。但在从 1945 年底至 1946 年春的短暂期间内，大陆和台湾的留日学生团体迅速进行了统合。于 1946 年 5 月 22 日成立了统一全日本大陆和台湾留学生的团体“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后改名为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以下简称：同学总会）。同学总会的成立，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²。统一了大陆与台湾的留学生团体的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在日本战后的特殊环境下得以实现的。而且随着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化、中国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建国等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留日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也发生了巨变，随着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同学总会也在不同的时期担负起了其不同的历史使命，并发挥了它特有的历史作用。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下述战后初期组织救济贫困留日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宣传组织留日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在日本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

一、战后初期组织救济贫困留日学生

可以说在 1946 年成立之初到 1952 年期间，同学总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广大留日学生的基本生计问题，为了解决留日学生的生活问题与 GHQ、日本政府、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以下简称：驻日代表团）、人民政府交涉协商救济办法。特别在从战后初期至 1949 年，拥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的留日学生，能够领取到为盟国国民准备的特别配给，同学总会以及其“下部组织”的各地同学会还作为领取和分发特别配给的机构作了贡献。战后初期的留日学生的生活问题可以说与其他国家有着根本不同，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救济，留日学生就有可能到“冻饿致死”的地步。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作为战败国其政治经济等全被由美国主导的 GHQ 所控制，生活物资基本依靠政府统一配给，又由于战后的经济秩序的荒废，黑市猖獗，物价飞涨，社会生活已经不能维持正常³。

1945 年 8 月 15 日当时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不仅有为数众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华侨、战俘和劳工，还有众多从台湾来的华侨和学生。其中中国战俘和劳工大都是在战争期间

¹关于战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称呼，在当事人和研究人员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在本文中用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和教育部档案和留学生发行的报纸杂志中使用最多的“留日学生”的称呼。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留日学生”即指在日中国留学生。

²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日本僑報社，2004 年，第 59-60 页。

³《駐日代表團張鳳舉函陳教育部留日學生概況及用費意見》，載林清芬編《台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留學日本事務（一）》國史館，2001 年，第 5-12 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被带到日本的中国军人和劳工，他们在日本没有生活基础，日本战败以后又失去了工作，生活极其困苦，因此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乘坐 GHQ 提供的遣返外国人的船只回到祖国⁴。故遣返外国人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实际上还留在日本的中国人大多为留学生和华侨。华侨家庭多是从战前已经经过了几代人在日本的打拚，谋生有方，具有一定生活基础。而中国留日学生，多数是在战争期间到日本留学，其中更有许多是由台湾、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等殖民地政府和日本伪政权派遣赴日的。由于日本战败，为他们提供生活来源的派遣政府也随之垮台，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汇款业务也被停止，故而他们也无法得到其家庭的援助，只能自己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窘境⁵。

1946 年 5 月，由驻日代表团送交教育部的名为《留日学生概况》的报告中，对于从 1945 年至 1946 年 3 月的留日学生的情况进行了以下说明：

“我国抗战前留日学生人数约在二万以上，抗战起后大部归国。伪成组织成立，官公私费生复陆续东来，截至太平洋战前，数近五千。太平洋战启，一部分归国。民国三十二年中，合伪宁、伪满学生，总计约近三千。其中伪宁约二千，伪满近千。空袭开始，又纷纷返国。直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强制疏散结果，伪宁学生，仅剩五百左右，伪满学生百名左右，蒙疆学生五、六十名左右。与今日之数，相差无几。今日除台湾籍学生外，各省留此学生总数，为四五六名。台湾籍学生，据台湾学生联盟之报告，为七六五名。合计现在留日学生总数为一二二一人。

抗战期间，各生除自费者外，学费来源约分四种：一、日政府与伪组织双方发给者；二、伪组织单独发给者；三、在中国之日军政机关供给者；四、中国之教育或社会机关派遣者。

日本投降后，中日汇兑断绝，学生自行向日本外务省交涉结果，日方允对于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日给二百元，高等专门以上者，给百八十元，概称贷金。官费生之受补助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二百元，高专生补足成百八十元，其所补足之额，亦称贷金。去秋以来，物价飞涨，本年一月，学生等又向日方作第二次之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五百元，其贷金与官费之分别计算，法一如前定。台湾籍以外之学生，一律照上述办法领费。台湾籍学生，则不由日外务省领费，而由日厚生省领费，每月每人领取百五十元⁶”。

从以上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战后初期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留日学生虽然没有了来自原来派遣机关、祖国家人的汇款，但为了确保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费用，从日本战败到 1946 年 1 月他们自己与日本政府交涉，不仅获得了学费和生活补助金，还在物价上涨生活再陷困苦之时

⁴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監修《GHQ 日本占領史 第十六卷 外国人の取扱い》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 年，第 19—26 页。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第 233—241 页。

⁵川島真《日本占領期華北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めぐる動向》，载大里浩秋·孫安石編著《留學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關係史》御茶ノ水書房，2009 年，第 213—238 页。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载劉傑·川島真編《一九四五年的歷史認識——〈終戰〉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第 31—51 页。

⁶《駐日代表團張鳳舉函陳教育部留日学生概况及用費意見》，载林清芬編《台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留學日本事務（一）》第 5—12 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再次与日本政府交涉获取了进一步的援助。如此来自伪满洲国、蒙疆政权、汪伪政权统治地区的留日学生们在日本战败后很快就团结起来作为中华民国的留日学生开展运动并争取自身的权利。但是，台湾学生却与他们明显待遇不同。这是因为，作为日本殖民地台湾的华侨和学生，在战后初期他们还没有得到中华民国的“战胜国国民”身份，而是被 GHQ 认定为“解放国民”⁷。

现在反观以上两岸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的交涉过程，可以看出这些活动不可能由个人去进行交涉，可以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成果。战争期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有各自的组织，比如接受伪满洲国驻日大使监督的“满洲国留日学生会”、以蒙疆和日本政府为后盾组织起来的“在日蒙古学生修养会”、在日华学会留学生教育部指导下设立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作为抗日学生团体的“东亚青年抗日同盟”和各大学内的台湾同学会等。然而，因为战后在中国大陆的伪政权、台湾的殖民地政府垮台，日本本身也成为战败国，所以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留日学生开始组建与伪政权和日本政府无关的新团体。当然，战后日本的中国人团体的组建，并不是始于留日学生，而主要是由日本各地的华侨开始的，留日学生的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环⁸。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之后，在由台湾华侨发起的台湾同乡会成立的同时，统合台湾学生的组织也开始筹建⁹，并于 1945 年 10 月 8 日在东京女子大学讲堂举行了“台湾学生联盟”成立大会。决定把联盟活动地点设在清华寮（在东京的台湾学生宿舍），选出罗豫龙为第一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长。11 月 11 日，发行了机关杂志《龙舌兰》的创刊号¹⁰。

同时在东京地区的大陆留日学生于 1945 年底成立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以下简称：东京同学会）¹¹。东京同学会成立之后，北海道、盛冈、仙台、横滨、京都、大阪、神户、福冈、长崎等地的同学会也相继成立。1946 年 1 月，东京同学会讨论干部的构成，决定在选出博定为代表的同时，从台湾学生联盟中選人出任副代表¹²。这一行动为全日本的大陆和台湾留学生团体的统合迈出了第一步。其后以东京同学会为中心，日本全国各地的大陆和台湾的同学会组织开始共同筹建“中华民国留日同学总会”（同学总会）。在 1946 年 5 月 22 日同学总会的成立大会上，选东京同学会主席博定为同学总会主席，台湾学生联盟委员长罗

⁷外務省編《日本占領重要文書》（第一卷基本編），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9 年，第 112-166 页。

⁸許淑真《「留日華僑總會の成立に就いて（一九四五—一九五二）——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载山田信夫編《日本華僑と文化摩擦》巖南堂書店，1983 年，第 119-187 页。

⁹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第 54-56 页。

¹⁰何義麟《戦後台湾人留学生の活字メディアとその言論の左傾化》，载大里浩秋編《戦後日本と中国・朝鮮——プランゲ文庫を一つの手がかりとして》研文出版，2013 年，第 120-168 页。

¹¹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的成立日期，在何義麟《戦後在日台湾人之处境与認同：以蔡朝焯先生的經歷為中心》，载《台湾風物》第 60 卷第 4 期，2010 年，第 161-194 页和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第 31-51 页中记录为 11 月 26 日，但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第 58 页中则写为 12 月 16 日，所以其具体的成立日期仍需考证。

¹²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第 31-51 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豫龙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发行同学总会机关报《中国留日学生报》¹³（以下简称：《学生报》）。

《学生报》于 1947 年春开始发行，主要报道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各地留日学生的动向等。《学生报》不仅发送到全日本的留日学生手中，还发送到一部分华侨子弟手中，因此《学生报》很快就发展成为在留日学生、华侨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¹⁴。

东京同学会和台湾学生联盟，进而同学总会成立以后，积极为解决留日学生的生活问题奔走，首先如上文所述，与日本政府交涉获得了在战后初期生活困难时期的生活补助费。其后又通过在北京的与中华民国政府（以下简称：国府）高层关系密切的原留日学生北平市博爱医院院长金子直向北平行营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等陈情，希望获得救济或支援其回国。金的陈情得到了何应钦和蒋介石的重视，指示教育部和外交部派员赴日与 GHQ 协商援助中国留日学生事宜。这也加快了同学总会统合两岸学生组织的进程¹⁵。由此驻日代表团赴日之后还于 1946 年 8 月成立了专门负责教育文化宣传方面业务的第四组，主要负责留日学生的相关业务。而在驻日代表团赴日之后，日本政府就要求驻日代表团接管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问题，并于 1947 年 6 月和 9 月停止向台湾和大陆学生发放名为“贷金”的补助金¹⁶。

驻日代表团在也曾在同学总会的要求下，希望解决留学生的救济问题，制定了救济和召回之两项计划。因为在日本长期救济留日学生需要大批经费，而当时中日之间又不能汇兑，所以国府考虑的只是暂时的救济，并且因为国府不希望出这笔经费，从 1946 年到 1949 年初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 GHQ 和日本政府协商，希望由庚子赔款的日本部分中支出或先由日本政府垫付两千万日元用于留日学生救济，其后再从日本向中国支付的赔款或中国的在日资产中扣除。但此两项提案，一直得不到 GHQ 和日本政府的支持，可以说驻日代表团三年的交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一直到 1948 年底，同学总会也没能从驻日代表团那里得到任何救济资金

¹³经笔者确认，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机关报于 1947 年 1 月创刊，1947 年 3 月 10 日～1947 年 4 月 30 日的名称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旬报》，1947 年 5 月 1 日～1948 年 1 月 30 日的名称为《中华留日学生报》，1948 年 5 月 4 日以后的名称为《中国留日学生报》。在本文中除了注以外，全部简称为《学生报》。本文使用的《学生报》是从以下三处收集来的，①Prange 文库；②由横滨华侨陈立清先生的遗孀捐赠的资料设立的陈立清文库；③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郭平坦先生提供的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¹⁴陳来幸《在日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脱日本化——戦後神戸・大阪における華僑社会変容の諸契機》，载貴志俊彦《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地域社会と「外国人」問題》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 年，第 83-105 页。林连德《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侧记》，载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年，第 397-404 页。

¹⁵台湾国史館館藏中華民國外交部档案「留日學生」入藏登錄号 020000030933A，典藏影像号 020-010105-0033-0020x～0028x，1938 年 3 月 3 日～1956 年 9 月 27 日。《中国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電教育部為留日學生生活困難請求救濟請核辦見覆》，载林清芬編《台湾戰後初期留学教育史料彙編 留学日本事務（一）》第 265-266 页。

¹⁶《駐日代表團張鳳舉函陳教育部留日學生概況及用費意見》，载林清芬編《台湾戰後初期留学教育史料彙編 留学日本事務（一）》第 5-12 页。《駐日代表團張鳳舉函陳教育部長朱家驊留日台籍學生留學經費等八項事》，载林清芬編《台湾戰後初期留学教育史料彙編 留学日本事務（一）》第 21-24 页。台湾国史館館藏中華民國外交部档案「駐日代表團第三組工作報告」入藏登錄号 020000001227A，典藏影像号 020-010121-0008-0246a～0247a，1947 年 5 月 5 日～1948 年 8 月 18 日。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17。

但是在此期间，通过同学总会和各地同学会的努力，包括台湾学生在内的留日学生完成了在同学总会和留日华侨总会的登录，作为战胜国民可以领取特别配给，许多留日学生则靠贩卖领来的配给物资维持生计。但即使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于 1949 年 5 月以消减预算为由一律停止发放特别配给¹⁸。

由此可以说 1949 年 6 月以后是留日学生生活最为困难的时期，同时在 1949 年以后，同学总会与驻日代表团的关系也已经趋于崩溃，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在留日学生救济资金难自己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国府以教育部为中心于 1947 年初制定了召回留日学生的计划，但因为 1946 年的涩谷事件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让以台湾学生为主的留日学生对国府产生了极深的不信任感，而国内的汉奸审判又使一些来自原日占区的留学生们对回国犹疑不定，这就使国府制定的召回政策更增加了留日学生的疑虑，而且由于当时国府财政困难，在召回计划制定以后，国府又不能负担准备回国留日学生的旅费，准备安排留日学生们乘中国的货船回国，可最后连到达中国港口后的些微旅费都无法筹集使召回计划基本完全破产，如此种种无能表现让留日学生们对驻日代表团失望无比¹⁹。

其二是驻日代表团的腐败更让留日学生们对国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在 1947 年由于召回问题同学总会和驻日代表团开始疏远以后，同学总会就通过向留日华侨的团体和个人求助等方式设法筹集资金，组织奖学金希望救济广大留日学生的生活²⁰。可是终究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需要寻求祖国政府的帮助，在此情况下，同学总会除了与日本政府协商以外，还不得不向作为驻日中华民国的代表机构的驻日代表团寻求援助，可是一直在 1948 年为止，驻日代表团并未给他们提供任何救济金²¹。反而在 1949 年 6 月同学总会的干部向往返中日两国的工商业

17 《駐日代表團張鳳舉函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檢呈救濟留日學生辦法請行政委員及教育部核准經費》，載林清芬編《台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留學日本事務（一）》第 274-280 頁。台灣國史館館藏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駐日代表團第三組工作報告」入藏登錄號 020000001227A，典藏影像號 020-010121-0008-0246a~0247a，1947 年 5 月 5 日~1948 年 8 月 18 日。許淑真《留日華僑總會的成立に就いて（一九四五—一九五二）——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第 119-187 頁。

18 「學生への特配」『中華留日學生報』1947 年 5 月 1 日。《駐日代表團張鳳舉函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檢呈救濟留日學生辦法請行政委員及教育部核准經費》，載林清芬編《台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留學日本事務（一）》第 274-280 頁。台灣國史館館藏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駐日代表團第三組工作報告」入藏登錄號 020000001227A，典藏影像號 020-010121-0008-0246a~0247a，1947 年 5 月 5 日~1948 年 8 月 18 日。許淑真《留日華僑總會的成立に就いて（一九四五—一九五二）——阪神華僑を中心として》第 119-187 頁。

19 《行政院指令教育部留日學生應由駐日代表團設法使其搭運我國易貨物資船隻回國所請結撥召回經費外匯應毋庸議》，載林清芬編《台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留學日本事務（一）》第 84 頁。《駐日代表團張鳳舉函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檢呈救濟留日學生辦法請行政院及教育部核准經費》，載林清芬編《台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 留學日本事務（一）》第 274-280 頁。

20 《ポンと一万円：學生救濟漸く具体化》，載《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旬報》1947 年 3 月 30 日。

21 《論說 われわれの最低生活を保障せよ》，載《中國留日學生報》1948 年 9 月 1 日。《代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者寻求帮助的时候，才发现驻日代表团已经向他们征收了一年多为救济留日学生的预留金，他们在日本的贸易都要交出 4% 的金额给驻日代表团以救济留日学生。而驻日代表团一直隐瞒此一事实，在此事被同学总会干部打听到并问及时，驻日代表团的干部先是不得已承认，但在其后又矢口否认，最终那笔据说有 12 万美金的救济留日学生预留款也终未能查到用于何处。而在《学生报》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报道之后，驻日代表团干部十分愤怒，开始对同学总会和《学生报》的政治思想进行批判，使关系趋于破裂的边缘²²。

以上这两个原因，也是包括同学总会的干部在内的大部分留日学生在战后较早的时期就已经从支持国府转为支持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原因之一。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同学总会与驻日代表团的对立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在留日学生救济和召回的问题上明显爆发出来而已。同学总会与驻日代表团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同学总会成立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亲共的留学生组织。据原同学总会干部郭承敏回忆，在同学总会成立之初内部已经有日本共产党的支部作为领导，而留日华侨总会的杨春松也是中共和日共的双重党员，对留日华侨和学生的运动进行指导，在战后初期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²³。

特别在 1948 年以后，中国内战的战况越发向中共胜利的方向发展，留日学生、华侨对内战的关注也日益高涨。另外，日本共产党也经常召开有关中国内战的演讲会，宣传国民党的腐败、中共的民主政策、胜利情况等。同时《文汇报》、《工人日报》等报纸也接连不断的被寄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受这些报纸的影响，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再者战后共产主义的书籍在日本解禁，在日本共产党等的努力下，许多共产主义的相关书籍在日本出版。另外中共和毛泽东的相关著作也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相继出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则成为众多留日学生的热读书目。受其影响，众多留日学生开始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身上²⁴。《学生报》也从 1948 年 11 月开始，每期都对解放区的生活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行报道²⁵。1949 年 5 月 1 日的劳动节，同学总会的学生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参加了东京的劳动节大游行²⁶。

在此情况下，GHQ 和驻日代表团也开始注意同学总会的亲共行为，进行调查。在内战中处于劣势的国府此时也为了挽回在留日学生中的声望，在 1949 年 5 月下旬，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5 月 22 日，同学总会东京会员大会开会时，驻日代表团团长来到会场，在表明关心留学生的同时，关于救济问题，他明确指出“关于学生救济问题，首先由驻日代表团拿出临时救济金，然后再向国内政府当局发电报，寻求用公费或其他方法来解决。其基本态度是由国府

表団組長さん達と留日学生の歓談会》，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8 年 12 月 1 日。

²² 留日学生救济基金 十二万ドルの行方は？ 奇怪な代表団の措置》，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 年 8 月 15 日。

²³ 对原留日学生郭承敏的采访，2011 年 9 月 21 日，天津。

²⁴ 杨国光《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记杨春松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载《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 年，第 1—11 页，对留日学生 B 的采访，2007 年 11 月 23 日，北京市，对留日华侨凌星光的采访，2007 年 12 月 12 日，东京都。

²⁵ 《中国留日学生报》1948 年 12 月 1 日～1949 年 9 月 15 日。

²⁶ 王毓声《报效祖国 初衷未改》，载《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 44—49 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或通过侨胞的努力研究出彻底解决救济留日学生的方法”²⁷。

团长的诺言很快得到兑现，驻日代表团临时救济金 16 万 5000 日元拨款到位，同学总会在无法得到其他援助的情况下，决定先接受驻日代表团的援助，开始首先发给因病住院的 50 名留日学生²⁸。

关于留日学生的粮食问题，《学生报》介绍了同学总会向 GHQ、日本农林省提出申请拨发应急米的情况，为了配合申请，提出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对各地的留学生团体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²⁹。其后于 6 月 25 日，经同学总会全国代表委员会讨论，成立了向留学生发放救济金的全国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奖学金（以下：奖学金）³⁰。7 月 25 日，同学总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奖学金章程，由关东地区 5 名、关西地区 3 名、华侨 3 名理事组成奖学金理事会，理事长由同学总会主席兼任³¹。其后驻日代表团决定由国府汇款到日本解决留日学生的救济问题，从 1949 年 11 月开始发放留日学生补助金。本来奖学金希望掌控驻日代表团提供的补助金的发放权，但驻日代表团由于担心同学总会的亲共立场，决定在团内成立留日学生救济金保管委员会负责发放补助费。但各地同学会看到领取代表团补助金名单以后纷纷提出质疑。例如，京都同学会委员指出“11 月份的领取补助金名单之中，真正认真去学校读书的只有 1 人”。对于这种指责，代表团辅导委员会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明确表示会充分参考同学总会提供的资料来甄选救济对象。另外，同学总会也将 12 月份的名单全部刊登在《学生报》上，希望在留学生中广泛征求意见³²。

尽管如此驻日代表团还是一直拒绝同学总会参加对补助金的管理。在此情况下，同学总会转为保护领取补助金过程中的留日学生的利益。比如，1950 年 5 月 27 日，同学总会各地代表就补助金的分配名额提出质疑，并就外地与东京的补助金额存在差距的问题提出交涉，希望能够让各地留学生领取相同金额的补助。在与代表团会交涉的同时，还向日本全国的华侨呼吁帮助以“反政府言行”为由而被停发补助金的留学生进行救助活动等运动³³。

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团与同学总会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特别是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1951 年以后，进一步恶化向彻底决裂的方向发展。在 1951 年 1 月 27 日的《学生报》上，用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代表团向同学会发通告要求停止活动》、《代表团调查同学会》、《对违法搜查进行抗议 日本警官滥用职权》等文章，其紧张关系可见一斑。这些报道中所揭露的主要内容是，对于驻日代表团将同学总会亲共的态度、行动视为问题，进而以发现中共寄来的报纸、杂志等资料为由，借助日本警察之力强行搜查同学总会的事务所，并反对韩庆愈就

²⁷ 《同学總會だより 東京会員大会朱代表団長来場》，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 年 6 月 1 日。

²⁸ 《同学總會だより 救济問題》，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 年 6 月 15 日。

²⁹ 《特配問題》，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 年 6 月 15 日。

³⁰ 《奨学会成立す 苦学会も合併か》，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 年 7 月 1 日。

³¹ 《留日学生奨学会成立》，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 年 8 月 15 日。

³² 《未だ波紋多し 留日学生救济問題》，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0 年 2 月 1 日。

³³ 《全国会員代表大会》，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0 年 7 月 1 日。《補助金被停止者を救へ—清風寮で拠金—》，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0 年 9 月 15 日。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任同学总会主席，命令同学总会停止活动等事宜进行了批判³⁴。

由于驻日代表团的镇压进一步强化，韩庆愈在对本身的批判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在主席就职演讲中就补助金问题强调：“对于代表团的补助金问题，同过去一样，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按照诸位同学的要求，期望确保其合理性与公正性。首先，要遵从在全国代表委员会大会上对奖学金救济问题达成的决议，对并非以经济理由而被停发补助金的同学发起广泛地募捐活动，补贴其不足部分（加上募捐金额最高到 3 千日元），通过这些活动希望能资助他们的学习和研究”。

但其后驻日代表团对同学总会和留日学生的亲共态度越发不能忍耐，在 1951 年 4 月份发补助金放时，要求领取补助金的学生在 5 月 4 日要到代表团事务所集合，要求他们听取团长和第二组长的训示，其真正意图则是要求学生们向国府宣誓忠诚。经过同学总会的努力，当天的宣誓没能进行，并给当天参加的学生发放了补助金。但驻日代表团对没参加的同学却让由出席会议的同学将训示内容传达给他们后，要求他们写感想文，提交以后才能领取 4 月份的补助金。另外，《学生报》还刊发报道了 5 月 4 日训示时代表团组长的发言：“谁明确声明反对同学会的态度，代表团就发给谁 5 月份的补助金”³⁵。因为驻日代表团要求用对国府的忠诚宣誓书来换取代表团的补助金，所以放弃补助金的留学生剧增。到 1952 年 5 月，领取补助金的中国留学生只剩下 68 名，根据同学总会的调查，其中还包括王枢等代表团的“特务分子”。在此情况下驻日代表团宣布——对于毕业生截止到 1952 年 4 月，对于在校生截止到 5 月就要停止发放补助金的通知。其后原因虽然不明，仅限于在校生的补助金停发的日期得到了延长³⁶，但最终代表团的补助金还是于 1952 年 9 月份在事前未通知的情况下彻底停发了³⁷。

1952 年 9 月，面对代表团补助金停发的同学总会和留日学生，在同月末迎来了从祖国大陆传来给他们发放救济金的喜讯³⁸。这笔从祖国汇来的救济金的汇寄单位是华侨事务委员会（以下：侨委）³⁹。据说侨委寄来救济金是因为已经回国的同学总会成员向侨委汇报了留日学生们失去救济的情形之后，侨委商讨后才决定为救济留日学生提供这笔资金援助的。而且，首次汇到的 7900 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到后来同学总会的成员才知道对不是人民政府国家公派的留学生，为以个人理由生活在海外的一般留学生发放解决生活问题的救济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例，日本以外的国家未发现类似事例，所以可以看出留日学生救济金是国家

³⁴ 《同学会的一致団結を 総会韓慶愈主席挨拶》、《活動を停止せよ 代表团 同学会へ通達》、《代表团同学会を調査》、《不法さ往査に対して抗議 日本警官職権を濫用》，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1 年 1 月 27 日。《日本警官を告訴す——同学会不法捜査事件》，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1 年 3 月 7 日。

³⁵ 《団結の力で粉碎 団 忠誠宣言をひっこめる》，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1 年 5 月 12 日。

³⁶ 《代表团、在学生の補助金停止を延期》，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2 年 5 月 25 日。

³⁷ 《主張 大同団結を訴う》，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2 年 10 月 15 日。

³⁸ 《更に祖国より二萬ドルの送金 “思想の如何を問わず、すべて救济”》，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2 年 12 月 10 日。

³⁹ 《感謝状》，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2 年 10 月 15 日。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鉴于留日学生的特殊境况给予的特别照顾⁴⁰。再有，从救济对象的决定、到支付方法等事宜全权委托给同学总会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认为 1952 年 9 月当时，同学总会已经是得到人民政府认可的留学生团体，开始依靠同学总会来发放救济金和管理留日学生等事务了。

为了研究这笔救济金的运用方法，同学总会于 10 月 5 日和 6 日召开了全国会员大会，在大会上采纳了给包括华侨子弟在内的救济对象每人每月发放最高 6000 日元救济金的方案。还决定，为了更加公正地发放，要对救济对象进行审查，并设立审查委员会对救济金进行管理。具体来讲，就是构筑起对于留学生的申请要经过由各地区同学会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再由同学总会设置的中央审查委员会进行最终确认后才能最终决定支付的一套救济金发放系统⁴¹。

同学总会在听说祖国的救济金是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情况下挤出经费的情况下，许多留学生对祖国表示感谢，并发出希望节约、公正使用救济金的呼吁。另外《学生报》在强调与驻日代表团的救济金之不同点的同时，也刊载了不少批判驻日代表团活动的文章。这些在 10 月 5 日的《学生报》中的《来自祖国无限的爱》、《想象你胃里的感觉吧》、《从救济金中学到的》、《与“团”的救济金不同》等醒目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来。

各地留学生的申请提交后，审查委员会很快进行了第一次审查，1952 年 11 月就开始发放救济金，就在此时同学总会又收到侨委发来的“再汇 2 万 2 千美元”的电报，因此，同学总会进一步研究如何扩大救济对象，再加上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使同学总会的业务异常繁忙。进而，在电报到达一个星期以后，又收到侨委寄来的信，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些钱请用作救济之用，生活上明显困难的同学，纵使思想进步慢一些，也可以进行救济”。与要求签署忠诚誓言书，追究学生政治态度的代表团的救济金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此人民政府的姿态将留日中国留学生的心牢牢抓住了⁴²。其后侨委的救济金一直持续到 1957 年生活困难的留日学生都已从学校毕业，同学总会成员基本上都变为在日本有生活基础的华侨子弟为止⁴³。可以说在同学总会和其前身的两岸留日学生组织的努力下，从 1945 年日本战败到 1957 年期间，留日学生生活困难的问题得到了日本政府、GHQ、国府、人民政府和留日华侨等各方的帮助，维护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权益，并在此期间内赢得了人民政府和留日华侨的信任。

二、宣传组织留日学生回国建设新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 12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直属机关“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以下：回国委员会）⁴⁴。28 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放了号召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国家建设的邀请。同时，周

⁴⁰ 《救济金停止の経緯（解説）》，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7 年 6 月 1 日。

⁴¹ 《十月より救济、月額六千円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で救济金处理案を決定》，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2 年 10 月 15 日。

⁴² 《更に祖国より二萬ドルの送金 “思想の如何を問わず、すべて救济”》，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2 年 12 月 10 日。

⁴³ 《主張 同学会の進路 救济金停止に関連して》，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7 年 6 月 1 日。

⁴⁴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6 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周恩来总理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呼吁留学生回国⁴⁵。1950 年 6 月 18 日，同学总会收到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来信，内容为代表人民政府欢迎留日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后，一部分留日学生也分别收到了由教育部回国留学生招待处直接发来的回国邀请信。在邀请信中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您及其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⁴⁶。

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一部分留日学生开始秘密回国。当时，日本政府与新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与日美两国转为敌对关系，留日学生回归祖国大陆，必须办理复杂的手续，而且需要利用各种途径才能回国⁴⁷。所以，1949 年至 1952 年间回国的留日学生人数只有 102~300 人⁴⁸。

由于大部分留日学生是在战争期间就开始在日本的旧制中学就读的，这些学生 1951 年以后陆续从大学毕业。随着留日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加，希望回国的人也逐年递增，到 1953 年已经达到数百人的规模。另外，在华侨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希望回国。到 1953 年 6 月为止办完回国手续的中国人就达到 807 人之多⁴⁹。而且，在战争期间从台湾去日本的劳工，由于难以在日本维持生计，又不愿意回到国府统治的台湾去，希望回到中国大陆的人数也达到了数千人⁵⁰。在这种情况下，那种不公开的个别回国的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当时的局面了。

1952 年，中日两国已经开始就仍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回国问题进行交涉。日本政府也通过媒体报道了将派遣船只到中国迎接要回国的日侨的消息，留日学生和华侨也希望能利用此次日侨撤回船实现他们的归国愿望。1952 年 12 月，东京华侨总会等亲中国的团体把留日学生、华侨归国及送还中国俘虏遗骨的要求提交给日本政府和三团体（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并向人民政府提出了要求。之后，人民政府便积极地在撤回日侨的谈判中将留日学生、华侨的归国问题和遗骨送还问题提出来。会谈的结果，是将中方提出的利用撤侨船前往中国的航程中搭载希望归国的留日学生、华侨和遗骨这一要求委托给了日本红

⁴⁵ 许珑《奔向光明的时刻——记建国前后的留学生回国潮》，载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年，第 98—111 页。

⁴⁶ 郭平坦、陈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情况》，载《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 年，第 498—510 页。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 108 页。

⁴⁷ 根据郭平坦、陈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情况》第 498—510 页，出境手续由东京华侨总会统一办理。由留学生本人到东京华侨总会填写出境申请书，由东京华侨总会递送国民党驻日代表团侨务处。但侨务处无权扣留，必须送至盟军总部，由盟军总部审批。留学生出境理由只能写赴香港探亲旅游，由香港有关旅行社担保。因为没有直接去中国的客船，也只能搭乘去中国的货船，或经香港或其他国家绕道回国。因此，费用非常高、也相当费时间。出国时的审查也特别严格。

⁴⁸ 根据《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留学生情况》，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59—69 页，1949 年 8 月至 1952 年 12 月在中国教育部登记的归国留日学生人数为 102 人。根据《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 498—510 页，与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第 111 页的资料，1953 年前归国留日学生、华侨的人数为 300 人左右。

⁴⁹ 《在日本的中国人》，载《朝日新闻》1953 年 6 月 14 日。

⁵⁰ 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载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留学生归国记事》第 405—416 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十字会，而具体的实施方法双方也秘密达成了口头谅解，日本政府外务省也对此表示了理解⁵¹。但是，在那之后由于国府反对等原因，在日中国人利用撤侨船回国一事未能实现⁵²。为此，留日学生、华侨举行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人民政府也进行了配合⁵³。经过一连串的抗议活动，日本政府与国府进行交涉，国府的态度软化，同意准备在 1953 年 6 月出港的第四次撤侨船上搭乘中国留日学生、华侨⁵⁴。

1953 年 6 月 27 日由舞鹤港起航出港的第 4 次撤侨船成为留日学生、华侨的第 1 班归国船，551 名留日学生、华侨实现了回国愿望。到 1955 年为止共有 3178 名留日学生、华侨归国，可以称之为留日学生、华侨的回国热潮时期⁵⁵。如此留日学生、华侨的回国热潮的形成也是和同学总会的宣传密切相关的。而 1952 年侨委寄来的救济金又深深地温暖了留日学生们的心。在这种情况下，1953 年乘坐日本政府派遣迎接日侨的船回国正是苦于无法回国的留日学生们的最佳选择。而此时，同学总会等留日学生、华侨团体的宣传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同学总会、东京华侨总会等留学生、华侨组织立刻表示了对新中国的支持。之后，留日学生、华侨的组织就积极展开了对新中国的政策、情况的宣传活动。《学生报》和东京华侨总会的机关报《东京华侨报》几乎每期都登载中国的消息，在留日学生和华侨之间宣传新中国。特别是《学生报》，经常登载介绍中国大学教育的情况、回国留日学生来信等信息，介绍了在中国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的情况和回国留学生快乐的大学生活⁵⁶。生活艰苦的留日学生、由于经济原因不能上大学的华侨学生被这些报道所感动。这些宣传对于促进留日学生回国颇具效果。

另外，当留日学生们收到已经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寄给同学总会朋友的书信时，有时也会将书信内容登载到《学生报》上⁵⁷。留日学生从朋友的来信中了解中国的情况，其信赖程

⁵¹ 吳日煥《1950 年代日中・日台關係の構造--在日華僑・遺骨送還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に》，载《筑波法政》2006 年 3 月，第 153—176 页。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第 405—416 页。《旅日华侨、留学生归国问题有关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1953 年 4 月 28 日—7 月 4 日）。大澤武司《在華邦人引揚交渉をめぐる戦後日中關係--日中民間交渉における『三団体方式』を中心として》，载《アジア研究》49(3) 2003 年 7 月，第 54—70 页。《国府側と微妙な關係 日本政府も送還は希望》，载《朝日新聞》1953 年 5 月 21 日。

⁵² 《帰れぬ中国人》，载《朝日新聞》1953 年 5 月 9 日。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第 405—416 页。

⁵³ 《旅日华侨、留学生归国问题有关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05—00250—02、1953 年 4 月 28 日—7 月 4 日）。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第 405—416 页。《国家の協力求む 帰国希望者大会》，载《朝日新聞》1953 年 5 月 23 日。《中国人代表押掛く 帰国問題で外務省へ》，载《朝日新聞》1953 年 6 月 6 日。

⁵⁴ 《国府、了解の模様 在日中国人の送還 すべて日赤の手で》，载《朝日新聞》1953 年 6 月 2 日。《中国人送還決る 政府、日赤に一切を委す》，载《朝日新聞》1953 年 6 月 7 日。

⁵⁵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 年，第 511—512 页。

⁵⁶ 《学資の保証される学生政策》，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49 年 10 月 11 日。黄秀鳳《新中国の学生生活》，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3 年 11 月 5 日。《国外華僑團結起来！愛護祖国保衛自己的正当權益》，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3 年 11 月 25 日等。

⁵⁷ 《呂同学より帰国便り》，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5 年 4 月 20 日。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度是可以想象的。如此众多的留日学生和华侨才在 1953 年以后选择了回国祖国建设新中国。

其后在 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了国家的建设，要求要切实注意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方法，并阐述了高级知识分子不足的状况⁵⁸。参加该会议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为了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不足的问题，要号召吸引一万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回国⁵⁹。为了落实这一提议，高教部拟定了《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并发表了在 1956 年内至少要争取一千名留学生回国的工作计划，要求各部门通力合作⁶⁰，并希望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行促进留学生回国的活动⁶¹。

关于促进留日学生回国的活动，则制定了在 1956 年底前要争取 150 名留日学生回国的目标。1956 年 2 月同学总会接到了侨委副主任廖承志的来信，委托同学总会配合争取留日学生归国的活动。之后，同学总会和东京华侨总会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促进留日学生、华侨归国的宣传活动。其盛况在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报》和《大地报》（在日本发行的中文报纸，详情后述）上也可以看到⁶²。

1956 年 3 月 1 日的《学生报》上，刊登了 1 月 14 日周恩来总理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全文，传达了 1 月 30 日召开的人民政协会议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盛况，并介绍了郭沫若在该会议上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为题所作的报告的内容等。这些都是介绍新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可以把它看成是促进留日知识分子回国活动的开端⁶³。

⁵⁸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二）》，载《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30 日。

⁵⁹郭平坦、陈富美《建国初期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归国状况》第 498—510 页。

⁶⁰《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第 24—25 页。

⁶¹例如，根据《关于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的方针任务措施等意见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1—00239—05，1956 年 1 月 27 日），《外交部关于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事给驻外使馆的指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8—00852—05，1956 年 3 月 19 日—10 月 4 日），外交部从 1956 年 1 月开始就有关促进留学生回国的方法研讨，同年 3 月向中国驻外国大使馆、领事馆打电报，下达了劝说留学生回国的命令。根据《争取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归国工作的有关文件》（北京市档案馆档案，2—10—76，1956 年 12 月 20 日—1959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市政府建立了北京市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研讨并实施促进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方法。

⁶²《外交部关于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事给驻外使馆的指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18—00852—05，1956 年 3 月 19 日—10 月 4 日）。郭平坦《留日同学会引导我们走爱国回国的道路》第 405—416 页。《祖国欢迎留日知识分子—勿多顾虑赶快回来参加祖国建设》，载《大地报》1956 年 4 月 21 日。《同学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 号召知识分子参加祖国建设》，载《大地报》1956 年 5 月 1 日等。

⁶³《知識分子の問題について 周恩来中共中央書記》，载《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 年 3 月 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期全国委员会第二回全体會議》，载《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 年 3 月 1 日。《中国科学を十年で世界水準に 錢学森教授可能性を論証》，载《中国留日学生报》1956 年 3 月 1 日。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同年 4 月 1 日和 5 月 15 日的《学生报》都是介绍新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可以把它看成是促进留日知识分子回归国专辑，刊登了《祖国需要你们 学好了就回国》、《勿多顾虑，赶快回国来参加建设》、《现在是回国的好机会 人才不足》、《在和平中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 期待海外精英做贡献》、《祖国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 把我们所学的技术贡献人民吧》、《光荣的事业等待着你们》等显赫的标题辉映着纸面。在这些报道中，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祖国是多么需要留日学生，号召他们尽快归国⁶⁴。

还有，面向留日华侨发行的中文报纸《大地报》也在 1956 年 4 月 21 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祖国欢迎留日知识分子——勿多顾虑赶快回来参加建设》的文章，与《中国留日学生报》的号召相呼应⁶⁵。在 5 月 1 日和 11 日的报纸上也刊登了相关文章，踊跃促进留日学生、华侨回国⁶⁶。

正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华侨组织的归国促进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为了迎接被中国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兴安丸号撤侨船也于 1956 年 6 月 18 日在舞鹤港待命出港⁶⁷。留日学生、华侨为了实现利用兴安丸回国，6 月 15 日的《学生报》从第 1 版到第 4 版再度刊登了回国特辑。通过这些努力，167 名留日学生、华侨登上了 6 月 18 日出港的兴安丸，踏上了归国的旅途⁶⁸。在同学总会的努力下，乘坐 1956 年 8 月 20 日出港的兴安丸回国的留日学生、华侨达到了 220 人之多⁶⁹。

三、组织华侨学生协助中国政府的对日工作

1952 年春天中共中央任命廖承志负责对日工作，并决定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争取和日本人民进行贸易、友好交流的机会。对中国政府来说，在海外的华侨留学生组织也同样是中国开展对外工作的重要合作对象。特别是中日两国没有达成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日本没有常驻机构，和日本的经贸及人际交流都收到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在日本的亲共留日学生·华侨团体所能起到的作用则更不可忽视。而以同学总会和留日华侨总会为中心的留日学生·华侨团体在中国建国后就表明了支持中共建国的立场，成为中国政府在日本开展工作的重要协助团体。

⁶⁴ 《祖国需要你们 学んだら帰ろう》，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6 年 4 月 1 日。吳曙《現在是帰国的好機会 人材はあまりにも足りぬ》，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6 年 4 月 1 日。謝秋生《平和裡に社会主義社会に移行 海外インテリは期待されている》，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6 年 4 月 1 日。張賢《祖国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 把我們所学的技术贡献人民吧》，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6 年 4 月 1 日。林連德·王兆元《光荣的事业等待着我們》，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6 年 5 月 15 日等。

⁶⁵ 《回国留学生来信述 祖国欢迎留日知识分子——勿多顾虑赶快回来参加建设》，载《大地报》1956 年 4 月 21 日。

⁶⁶ 《同学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来信祝贺 号召知识分子参加祖国建设》，载《大地报》1956 年 5 月 1 日。《海外知识分子祖国欢迎你们》，载《大地报》1956 年 5 月 11 日。金慕箴《华侨青年指导的重要性》，载《大地报》1956 年 5 月 11 日。

⁶⁷ 《大批华侨回国参加建设》，载《大地报》1956 年 6 月 11 日。

⁶⁸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 511 页。

⁶⁹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 511 页。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中国政府和留日学生·华侨团体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侨委和廖承志来推行。而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在日本社会中宣传中国的最新政策与情况

爱国留日学生、华侨团体都有自己的机关报，1949 年建国后这些机关报也成为了宣传中国政策与社会情况的媒体。这从 1949 年以后的《学生报》和《华侨报》的内容上就可以看出。不过虽然这两份报纸每期上都会介绍一些中国政治、社会的新动态，但终究是为留日学生、华侨创办的报纸，建国后的报纸上还是有很大篇幅继续介绍在日本的华侨留学生动态和日本信息。

除了这些机关报，留日学生和华侨还专门为宣传中共的政策和思想而创办了面向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留日学生和华侨的中文报纸。

一直负责华侨业务的廖承志对在海外华侨团体、华侨学校一贯方针是让华侨以及留学生团体、学校能够长时间在当地生存。在办学时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倾向新中国”。兼管新华社的廖承志曾长时间负责中共的对外宣传工作，所以也非常重视在海外华侨中的宣传工作。当当时的同学总会主席韩庆愈在 1953 年 7 月作为乘船代表陪同归国留日学生、华侨回国时，得到从北京赶来的廖承志、杨春松等人接见。当时韩庆愈本来提出希望适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可是廖承志却提出来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宣传的重要性，希望韩庆愈回日本以后负责编辑出版一份中文报纸，在日本的华侨留学生中宣传新中国的情况。接受了任务的韩庆愈回日本后马上就开始筹备办报事宜。在华侨总会和爱国华侨商人等的帮助下，在 1954 年 3 月 1 日，由日本华侨主办的中文报《大地报》正式创刊。首任代表林庆英在创刊词中介绍该报的创刊目的为“第一、谋侨胞间的大同团结；第二、拥护人类和平；第三、爱护、发扬祖国；第四、加强中日两民族的友好；第五、共图（在日华侨的）福利”。廖承志直接授意筹办的《大地报》一直持续到 1970 年 1 月，最终在文革的影响下不得不停刊⁷⁰。

2. 组织留日学生·华侨协助中国访日团的工作

留日学生、华侨与人民政府人员接触，直接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个主要渠道是协助中国访日团在日本的工作。中国建国后一直受到美日两国反共政策的限制，中日两国的人际交流长期中断，而这种情况在协助日侨回国的谈判后得到了明显好转，而突破防线的首个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访日代表团正是和日侨回国有关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代表团到达之前已经受到全日本各地华侨留学生的关注，各地华侨纷纷提出邀请团长李德全到当地访问的要求⁷¹。1954 年 10 月 28 日和 30 日分两批到日本的访日团，团长由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来担任，副团长是廖承志，团员有伍云甫、赵安博、倪斐君、纪峰，秘书肖向前，随员吴学文，翻译

⁷⁰对留日同学总会原主席韩庆愈的采访，2007 年 12 月 10 日，东京都。林庆英《创刊词》，载《大地报》1954 年 3 月 1 日。

⁷¹《欢迎红十字会代表各地代表纷邀李德全 横滨提倡要回国归省》，载《大地报》1954 年 9 月 1 日。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王效贤、杨振亚⁷²。

面对祖国来的代表团留日学生、华侨主动承担起了在各地举行欢迎活动，营造友好氛围的工作⁷³。由于廖承志是副团长，日本媒体的注意并没有集中在他身上，大多主要报道团长李德全的行程。而廖承志在访问期间也积极访问各地，并多和华侨留学生接触，举行讲演会和座谈会。廖承志的讲演和谈话内容在《学生报》和《大地报》上都被大篇幅的报道，从报道量上来看可以说超过了对李德全团长活动的报道⁷⁴。

在华侨留学生热烈欢迎中国红十字访日代表团的背后，还有一支由留学生和华侨学生等青年人组成的保护代表团成员的保卫团。由于中日两国还没有邦交，国府也特别在意中国访日团的活动，经常派人干扰访问团的活动并动用各种人际关系希望策反访日团成员。为了保证访日团的安全，由侨委联系东京华侨总会帮忙安排日本政府安排的保安人员以外的中国华侨保安队。而这次的保安行动随之也成了每次中国访问团赴日期间的惯例。有时在举行大型的展览会等情况下被动员的华侨青年还会负责代表团成员的翻译工作。华侨青年保安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华侨学生和爱国侨领的子弟，许多都是同学总会的会员。而这些青年在这些保卫工作中通过和代表团成员的接触，接受了多方面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华侨团体的骨干，也有一些回国参加对日工作。访日团的保卫团也成了培养爱国青年华侨的一个渠道。廖承志经常作为副团长参加访日团到日本和这些华侨青年接触的也很多，并曾亲身教育和指导他们⁷⁵。

结语

战后在日本社会混乱，社会生活不能正常进行的时期，统合了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留日同学的学生组织同学总会的成立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首先，基本上生活在全日本各地的两岸学生基本上都在同学总会登录为会员之行为可以看出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战争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被日本政府监视、怀疑，被日本国民歧视，可谓受尽了苦楚。可是，战后中国成为战胜国，而作为战胜国民进行登记以后，即可得到日本政府和 GHQ 配发的特别配给，同时因为日本为被占领国，对战胜国民没有审判权，所以取得了战胜国民身份的中国侨民，在面对刑事或民事审判之时，日本的司法机构对他们没有裁判权，必

⁷² 思文《欢迎祖国代表》，载《大地报》1954 年 11 月 1 日。

⁷³ 《旅日华侨热烈欢迎祖国代表》，载《大地报》1954 年 12 月 1 日。

⁷⁴ 廖承志《謙遜・団結・友好》，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4 年 11 月 1 日。《李德全代表一行無事到着 出迎えに華僑千数百名》，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4 年 11 月 1 日。《在日華僑の心構え 神戸にて廖承志氏語る》，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4 年 11 月 15 日。《祖国代表歓迎に参加して 神戸同学会より寄せらる》，载《中国留日学生報》1954 年 12 月 15 日。思文《欢迎祖国代表》，载《大地报》1954 年 11 月 1 日。《欢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 各地准备均已就绪 东京举开侨胞大会》，载《大地报》1954 年 11 月 1 日。《怎样做一个新中国的华侨 摘录廖承志先生的讲话》，载《大地报》等。1954 年 12 月 1 日等。

⁷⁵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第 306-333 页。对回国留日学生郭承敏的采访，2011 年 9 月 21 日，天津。对回国留日华侨学生蔡季舟的采访，2009 年 2 月 25 日，北京市。对回国留日华侨学生王英兰的采访，2009 年 2 月 25 日，北京市。

王雪萍「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的历史意义——救济学生、组织回国活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编辑部编《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20 年》北京日本归侨联谊会、2015 年 9 月、第 111—127 页。

须由战胜国的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等，可谓在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胜国民有许多特权。在此情况下，包括众多台湾学生在内的留日学生聚集到同学总会之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1950 年代以后台湾学生和侨学生逐渐成为同学总会的主要成员，在众多大陆留日学生回国以后，他们也逐渐走上了同学总会的领导岗位，不仅领导同学总会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同时为留日华侨运动培养了众多的继承人，使留日华侨运动得以长时间承继下去。

其次在同学总会成立以后，同学总会为了保护留日学生的利益，在中日两国汇兑断绝的情况下保证留日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长时期不耐艰难地在于华侨协作的基础上，与 GHQ、日本政府、国府和人民政府进行协商，为广大留日学生争取到了在日本继续学习与生活的物资和救济金，这在战后生活极其苦难的情况下是来之不易的成果。

特别是在同学总会中共产主义思想广泛流传，亲共成员逐渐增多的情况下，同学总会不断被 GHQ、日本政府和国府监视并限制其行动，在后期还经常受到国府和日本警察的滋扰，这些更增加了同学总会为留日同学争取生活援助的活动。可是尽管如此，同学总会的成员们并不畏惧生活上的困苦，当驻日代表团提出要以向国府表忠诚来换取补助金之时，大部分的留日学生都放弃了驻日代表团的补助金，从这些行动也可看出留日学生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的爱戴与忠诚。在此情况下，从祖国侨委寄来的救济金，无条件地救济全日本各地的包括华侨学生在内的留日学生之举动，让广大留日学生大为感动，更增加对新中国的向往与支持。

在此情况下，同学总会和华侨们努力推进促进留日学生和侨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活动受到广大学生和侨的支持，在 1958 年以前有近 4000 人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学习和工作。同时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和侨也尽力协助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同学总会也在众多活动中担负了宣传和保卫、翻译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同学总会动员和教育全日本的留日学生和侨学生，就不可能达到众多留日学生和侨回国运动的成功，而在留日学生和侨中形成大规模的亲中共运动，配合人民政府的对日工作的局面也不可能展开。没有如此众多而细致的工作，1972 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也无法得到当时众多日本国民的支持。他们的历史功绩应该被永远记入中日关系的史册之中。